



量词的非范畴化特征及其动因机制研究

甘 莉

摘 要:量词以其形象性、生动性著称于世,是英语、俄语等外国语不能比拟的。量词概念的二元性(符号概念和类概念)使概念具有指称意义和陈述意义,构成了量词非范畴化的前提条件。量范畴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内在统一性,这是量词能够非范畴化的认知基础,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则是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通过转喻和隐喻,量词实现了非范畴化,从而获得量词数量属性以外的范畴意义。量词的非范畴化促进了语言的多元化,使得语言不再是单一、枯燥和乏味的范畴,获得了语言的审美特性。

关键词:量词;非范畴化;动因机制

语言的非范畴化是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非范畴化理论补充与改进了范畴化理论。量词的非范畴化结果必然带来范畴转移,而以词汇化或语法化为手段在“量词”词汇层面所遗留的痕迹成了这种“转移”最有力的佐证。或者说,“量词”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获得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但最终结果是“量词”的范畴发生转移,“量词”这种范畴属性的交互激活和不断扩展正是保持“量词”活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为进一步解读“量词”非范畴化的这种内在机制和动力,本文从量词的非范畴化、非范畴化特征及其动因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量词和量词的非范畴化

量词是人对外部物质世界分类的结果^①。量词是汉语的特色词类,它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特色和认知的范畴化特征^②。根据原型范畴理论,一个原型意义上的量词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从计量基准来源的角度出发,依据动作与事物、时间、空间、动作结果、动作自身等因素的关联,可知量词具有“数量功能”,即量词的主要功能就是计量;(2)从量词的句法分布特征上看,一般情况下,量词是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③,量词分布于定语位置(或称修饰语);(3)从量词的语义功能上来看,由于量词的主要功能就是计量,所以,量词“无论对名词还是动词都没有指代功能,量词都是普通的一种修饰性成分”^④,也不具有陈述功能;(4)由于量词具有的(1)、(2)、(3)的特征,促使量词的语篇能力较弱,往往需要搭配其他词汇或短句使用来完成其语篇功能。同时,量词更不具有篇章回指功能。然而,事实并非全部如此,我们发现在某些句子或篇章当中,量词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量词非范畴化后使得句子丧失部分形态句法特征;量词所在句子的语义更

①王绍新:《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68~176页。

②张启睿、舒华、刘友谊:《汉语个体量词认知研究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4期,第510~520页。

③宗守云:《量词范畴化的途径和动因》,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09~116页。

④宗守云:《认知范畴的原则共相与细节殊相——以汉语量词“条”和日语量词“本”的异同为例》,载《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2期,第44~48页。

加抽象和泛化;量词在非范畴化之后语篇功能扩大;量词非范畴化后,其本身的功能扩展与范畴发生转移。这明显与原型意义上的量词范畴的属性特征相悖,这就是量词的非范畴化。量词的非范畴化实际上就是量词丧失范畴属性(原型意义)特征的过程^①。

目前非范畴化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对名词和动词的非范畴化现象进行描述,如刘正光、贾君芳、王学文等;对非范畴化视域下的量词相关性研究很少,尤其是对量词范畴属性的内部动态性变化关注不够,如量词在非范畴化的影响下,其范畴成员内部属性的句法特征、语义是否抽象泛化、语篇功能是否拓展、量词功能是否扩展、量词范畴是否转移等动态的变化或转换过程关注不够,基本上还是空白。鉴于此,本文主要在非范畴化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研究量词这个词类范畴内部成员属性的动态变化过程——量范畴的游移或增减,拟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量词非范畴化后使得句子丧失部分形态句法特征;(2)量词所在句子的语义更加抽象和泛化;(3)量词在非范畴化之后语篇功能扩大;(4)量词非范畴化后,其本身的功能扩展与范畴发生转移。

二、量词的非范畴化特征

(一) 量词句法分布特征的丧失与扩展

根据非范畴化定义可知,量范畴成员经历了非范畴化过程,量范畴丧失其原有范畴属性的某些典型特征的同时,又获得了新范畴的某些不典型特征^②。这类不典型特征表现在句法特征上为:(1)量词丧失了其原型意义上的句法分布特征后而充当状语的情况;(2)量词扩展了其原型意义而获得新的其他范畴的某些特征时充当定语的情况。

1. 量词充当状语。量词在非范畴化之后,其范畴属性呈现出不稳定的中性化状态。量词的某些典型分布特征(句法或语义特征)消失,同时,又获得了新范畴的不典型特征,这种不稳定的中性化状态促使量词所在句子的句法形态发生改变,在语用上量词获得了新的交际功能,从而获得新的范畴属性,表现在句法功能上,量词可以充当状语。量词在句中可直接修饰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但是其本义不同程度丧失^③。如: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水浒传》第58回)。此句中,“对”所修饰的“头踏”,此时,量词“对”充当了句子的状语成分。名量词作状语修饰其句子中心语时,量词多以重叠式出现,有突显作用。由此,非范畴化后的量词重叠后可以用作状语,这类量词使得事物或数量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薄到厚,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延续性、渐进性,用于具体的语用环境中,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引人入胜。

2. 量词充当定语。量词在句子中一般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但是在“动词+量词+量词+宾语”的格式中,如果量词是“一”时,可以省略“一”,而让量词单独作定语。如:红灯谁闯罚谁,不信,你闯个看^④。句中的“个”紧跟在动词“闯”后,显然,此时的量词“个”已经丧失其计量功能,成为附加在动词后的起词缀性质作用的句法成分。因此,量词在整个语用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为适应语用需求,量词的词义产生虚化与结构关系发生改变,二者不断的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导致了量词搭配范围的扩大,使得量词以句子的附加成分存在,完成其非范畴化过程。即量词范畴属性为满足语用需求(或者说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认知需求)而不断转换或变迁,当这种转换或变迁达到一定程度时,最终导致句法结构的松动,出现了量词充当状语和定语的情况。量词获得了新的句法特征,可以接受形容词的直接修饰而充当定语,或充当句子的定语。即量词经过非范畴化过程后,丧失其计量功能,其句法分布特征同时也受到不同程度上的磨损,这种磨损又被其扩展的其他范畴特征所填补。

(二) 量词语义的抽象与泛化

量词非范畴化后新增加或扩展的意义是语用意义,是量词对语用环境变化的重新适应。当量词的

①李莹:《量词“个”的非范畴化》,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4~87页。

②赖先刚:《量词是体词吗?——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与语法功能》,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85~89页。

③陈勇:《数词非范畴化现象考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5~112页。

④李宇明:《说“VP”看》,载《汉语学习》1985年第6期,第78~84页。

不典型语义不断积累,量词语义得到充分的抽象与泛化,最终量词突破其原型意义的范畴属性,获得了新的句法与表义功能。据此,我们认为量词在非范畴化过程中的语义变化实际表现为:(1)量词语义的丧失;(2)量词语义转指;(3)量词语义的抽象泛化。

1. 量词语义丧失。量词语义丧失主要是因为量词直接与其他词类组合,语义逐渐凝固词汇化,导致其丧失计量功能。其次是来自量词本身深层结构的磨损^①。如:论蝴蝶意象在李商隐诗中的多重涵义(吴晶《浙江学刊》2001年02期)。例中量词“个”其原型范畴都具有一定的计量功能,但在例句中,其作为计量功能的量功能已经消失殆尽。通常,量词总和数词结合,来修饰限制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因此,量词的语义特征也体现在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互制约中。量词的非范畴化导致其语义虚化和结构关系的改变,所有这些因素不断的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再经过人们不断的认知加工和抽象,这使得量词词义最终丧失,导致了其搭配范围的扩大,进一步适应了语言的发展需要。

2. 量词语义转指。量词在非范畴化过程中会丧失其本义,同时衍生出一种新的意义。量词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新的、更为抽象的意义,其计量功能已经受到磨损或完全丧失,新旧范畴之间表现为一种“话语相关性”,这种“话语相关性”即“语义转指”,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量词本身语义的“丧失”。如:其畏谨着,又缩做一团,更不敢说一句话(《朱子语类·卷七十六》)。“打作一团”“哭作一团”与此相同,“一团”指向的都是发出打或哭动作的施事者,一般就是人,而不是称量的“打”或“哭”。打架的人往往会纠缠在一起,而痛哭之人身体肯定会收缩,其视觉形象就与圆球类似,故用量词“团”称量。原型意义上的量词,具有计量意义,但在例句中,“团”等都丧失了计量功能。语言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量词语义发生转指,这一认知操作过程,在微观的层次是转喻映射,在宏观层次是隐喻“投射”。至此,量词语义转指使得量词获得了新的语用意义,这种新的语用意义可能是临时的,也可能经过语用强化逐渐定型。这种发生语义转指的量词在范畴属性上,已经失去原有范畴属性。

3. 量词语义抽象泛化。量词语义的抽象与泛化其实质是量词丧失其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后为弥补这种丧失而建立在旧意义上的一种抽象的泛指,是“概念细节逐渐减少到只剩下语义核的过程”^②,这是一种认知范畴到质的认知范畴的迁移。如:a. 既张我弓(诗《吉日》)。b. 弓一张,矢四发(《汉书匈奴传》)。例句中的“张”只能修饰“弓”和“弩”。随着语用需要,量词“张”的语义进一步延伸,量范畴扩展到拉开或张开的物体,如“琴”、“帷幕”、“屏风”等,之后量词“张”获得描述拉开或张开的物体的语用意义经过语用强化逐渐定型。但是,为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认知与表达需求,量词实体“张”进一步非范畴化,其语义再次抽象泛化,扩展到使用时需要铺展开的事物,如“纸”、“毯”、“被”等。量词“张”的范畴属性就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语义延伸过程,或者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语义游移过程。“张”从动作域映射到中心名词范畴所指事物的扁平形状。促使这一转变得以实现的手段是隐喻和转喻,它同样也是人类认知不断演绎的结果。也就是说,量词实体有时并不是突变式的从一个范畴跨入另一个范畴,它们需要经历一个过渡的中间状态,量词的语义抽象泛化是个逐步变化的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从表层逐渐深入,最后失去量词本身的原型范畴属性。因此,我们认为量词语义的抽象与泛化是基于原有泛化意义的进一步抽象。

(三) 量词语篇功能的扩展

量词在非范畴化后,一方面丧失或扩展其句法分布特征,另一方面某些量词范畴属性逐渐扩展或增加,以满足量词语义特征或功能特征的多义性需求,即量词范畴成员属性“在语篇和信息组织上,实现语篇功能上的扩展”^③。量词本身的范畴属性不具有指称意义,其语篇能力较弱。但是,在很多具体的语篇中,与量词丧失或扩展句法分布特征、量词语义的抽象与泛化等非范畴化特征相反,非范畴化后的量词功能范畴属性得到扩展或外沿增加了(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范畴特征的盈余)^④。即量词语篇能力得

①李莹:《量词“个”的非范畴化》,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4~87页。

②张谊生:《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载《当代语言学》2003年第3期,第67~78页。

③Alice C Harris,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7.

④陈云香:《量词“颗”“粒”语义差别研究》,载《编辑之友》2010年第12期,第96~98页。

到了扩展。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这种扩展或增加不是任意的,是建立在隐喻或转喻认知方式之上的。如:那一粒浑圆、湿润清露似的月,从茫茫原野朦胧的深处跃向蓝丝绒般的天空,周围银箔一般的雪亮,极清极白,恍若一个没有封严的酒坛口,正汨汨流淌着不尽的清幽,把苍穹洗染得晶莹剔透,给眼前带露的青纱披上万点银粼(《政协会刊》2009年第二期)。句中的量词“粒”其本义为“米粒”,扩展后指“小圆珠形或小颗粒状的东西”。随着新的认知与表达需求的增加,通过隐喻式的抽象泛化,量词“粒”形体方面的含义获得了独立,并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替代了它的原始意义,成为一个量词,计量小颗粒状的东西,这时,量词“粒”的语篇能力得到拓展。以上例句中量词语篇能力的扩展,其实质是量词非范畴化后,突破了原有范畴属性的表达形式并扩展其语篇功能,用以表达新的概念,这都是思维创新的结果。量词非范畴化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创新方式,它是量词语篇功能扩展的心理操作机制。

(四) 量词功能与范畴的转移

从以上分析可知,量词非范畴化后,其句法分布特征的丧失与扩展导致了其语义的抽象与泛化,量词语义的抽象泛化和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量词突破其原型范畴,具有了与量词不同的句法功能与表义功能,从而量词的语篇功能得以扩展,使量词逐渐适用于不同的语境^①。量词在非范畴化过程中,由于语义抽象与泛化使量词丧失了量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而拥有了其他范畴的某些不典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量词的计量功能与范畴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移(在一定的阶段或许是暂时的),即“在语篇和信息组织上,范畴属性的典型特征发生功能扩展或范畴的转移”^②,由此造成的损失用语篇功能的增加来补偿。功能与范畴的转移是量词语法化的重要机制之一。我们来看例句:白色的酒,如透明之月;黑发抚弄着琴弦,溅起一粒又一粒冷硬的梦魇(《诗刊》2000年第12期)。张谊生认为例句中量词“粒”是宾语的标志,“粒”已经丧失其计量功能,成为附加于句子充当宾语和补语成分,“粒”的量词功能和量范畴发生转移。量词“粒”其本义为“米粒”,扩展后指“小圆珠形或小颗粒状的东西”。“一粒又一粒冷硬的梦魇”,量词“粒”和“梦魇”搭配、组合进入具体的语言环境,将抽象“梦魇”形象化,此时量词“粒”已经不再具备计量功能。用量词“粒”形容“梦魇”,化实为虚、将抽象事物具体化的功能以及创造新颖奇特的意境效果,量词的语用功能得到扩展,其量范畴的典型特征发生了转移。

三、量词的非范畴化动因机制

(一) 量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转喻机制

沈家煊指出,转喻是人们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常见的语言现象,其认知基础是类概念的邻近性关系^③。转喻的主要功能是在交际的过程中增强语言的信息性和关联性,用最突显、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事物来代替与之相关或由该事物联想到的另一事物。认知语法认为,词类的转化本质上是一种“概念转喻”。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在同一个认知框架内,以一个概念实体为参照点建立与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概念)的心理联系。

量词范畴属性的转移都是通过转喻的促动而把量词范畴扩展到相关领域的,转喻反映了量词逐步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质也是非范畴化的过程。比如,量词“张”,最开始“张”只能修饰“弓”和“弩”,属于典型的动词范畴,意为“拉开弓”,因此它所脱胎母体的名词就是“弓”。随着人类认知的需要,量词“张”的语义进一步延伸,扩展到所有使用时需要拉开或张开的物体,如“琴”、“帷幕”等。“琴”、“帷幕”等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物体张开后呈现平面形状,至此,凡表面属平面形状事物的名词就处于“张”范畴的中心地位,如“一张书桌”、“一张席子”、“一张地毯”等。李宇明指出,汉语量词“张”主要用于修饰平面类事物,但也可以用于“桌子”这样的立体事物,这是因为,“桌子”的功能性部位是桌面,而桌面是平面事物^④。除了个别量词的历时语义演变外,量词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转换是一个认知操作的过程,转喻

① 张积家、刘红艳:《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载《心理学报》2009年第7期,第580~593页。

② 刘正光、刘润清:《认知语言学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③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载《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1期,第34~38页。

④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4~279页。

是量词非范畴化生成和解读的深层认知机制。换言之,量词的非范畴化其实质是量词源域范畴内部具有邻近性关系的目标域之间的转喻认知。

(二) 量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隐喻机制

隐喻是指能在某个话语群引起一致类推的语言表达结构。隐喻是将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这种映射是基于相似性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过程。简单地说,隐喻是人们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具体到量词而言,当量词和某一类范畴选择稳定以后,会自然地向着性质、形状等相似的范畴进行延伸和映射,从而促动量词的范畴扩展,当这种扩展突破了量词本身原有的范畴时,就具有了与量词本身不同的句法功能与表义功能,这样的促动机制就是隐喻^①。

在隐喻问题上,传统意义上的映射应该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划分,静态的映射称为“匹配”,动态的映射称为“投射”^②。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首先体现为一种静态的“匹配”关系,也就是相似性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隐喻是通过使用源域中概念的一些特定蕴涵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射”到目标概念上去。由于量词的符号概念具有弹性和灵活性,在语言运用中表现为指称和陈述的相互转化,量词在原型范畴理论视域下以隐喻方式实现的静态“匹配”。同时,由于量词的类概念和人类认知具有灵活性,量词在非范畴化理论的框架下以隐喻方式实现的量词动态“投射”。比如说英国人对于“眼”的动态“投射”来自于“近于头部”、“椭圆形”、“深陷的”等特性的刺激,“眼”通过隐喻将其由名词范畴转移到量词范畴里来,如“一眼井”等;汉语“眼”的隐喻过程跟英语有些相似,如“一眼清泉”等。这表明不同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同一个概念的隐喻而获得相似的蕴涵来。从这个意义来说,量词的非范畴化就是从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隐喻迁移。

(三) 量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图式转换机制

图式是构建空间概念隐喻的路径;相似是构建空间概念隐喻的认知基础。隐喻的认知是把源域的图式内容投射到目标域,从而理解该隐喻。图式与隐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性,文本接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对源语中的隐喻先进行释喻,然后通过对隐喻进行移植、转换或其他手段,最大程度地保留隐喻的感染效果。图式是具体的,是围绕特殊的词汇进行的,隐喻是图式形成的关键因素。即隐喻本身也是一种图式,隐喻是图式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如此,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隐喻是一个认知范畴到另外一个认知范畴的映射,两个范畴可能属于同一图式,也可能与此无关;图式则是固定的认知结构模式,它可以把包含隐喻的两个范畴划归同一图式,也可以把不包含隐喻的不同认知范畴划归同一图式。

图式既是对范畴成员相似性的抽象概括,又是对新成员进行非范畴化的模板,量词非范畴化编码的是图式意义——对各种语境中所表达具体意义的概括。因此,量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图式和图式之间在某个特定的语境里可以相互转换。图式转换的促动也是导致量词非范畴化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形状量词往往就是一种意象图式,而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意象图式通常会因认知主体的作用而发生转换。汉英中之所以出现“非范畴化”的量词使用现象,是因认知主体的视角转换以及客观事物本身的多维性所致,由此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意象图式往往是动态的,具有不定性,此时,需要借助图式意象才能判断说话人的文本是否属于新的语境中所要表达意义的依据。交际中,说话人所交流的意义往往不同于(小于或大于)语言词汇所编码的图式意义。因此,听话人需根据语境知识,缩小或扩大图式意义来建构或理解说话人所要表达的具体意义。在汉语中,由于图式转换的促动所导致的量词非范畴化也有存在。例如量词“束”,其最开始意为细长类物体,如“一束花”。然而,随着人们认知的过程中“束”的范畴不断演化,“束”的范畴扩展到可以用来修饰拥有长轨迹的物体,如“一束光”,图式使本来抽象的思想、情感具体可感。在这个过程中,量词通过不断的丧失其量词范畴,通过量词本身所属范畴,文本接受者通过表象联想或意象感通将丧失范畴属性的量词意义进行扩展。再比如,

^①G. Fauconnier.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37

^②王军:《隐喻映射问题再考》,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54~57页。

“方”用于堆放的平面物,如“一方石头”;但“方”在经过非范畴化后,则失去了作为量词的范畴,从而获得了“面积”的范畴,如“一方霸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展来的,这是利用了平面物图式和平面轨迹图式转换的促动而形成的。

(四) 量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规约意象机制

量词数量众多、用法灵活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量词总是与名词搭配使用的,它们的搭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名词所代表的范畴的理解和认识,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认知内容。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分析理论和方法在量词非范畴化的运用方面有着独到的功能。意象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范畴,意象是对事物的感知在大脑中形成的表征,通过语言表达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意象意义。意象意义指的是说话者在心智经验上以不同方式理解同样场景的能力,它强调认知主体(说话者)的主观意义。意象的形成和视角、凸显、属性选择、详细程度有关。汉英民族使用量词时经常存在对相关事物对象进行突显,选择不同的认知域和视角进行转换所致。由于意象是人类的共同认知,而非个人,不同的人观察某一意象时,所形成的意象是相同的,因此意象具有规约性,是为规约意象。规约意象是量词丧失其数量范畴属性而获得其他词性范畴属性的语义结构基础。

在量词非范畴化的过程中,由于其失去原有数量范畴而拥有了非数量数词的特性,这是非范畴化从不同的视角观察量词范畴动态变化的结果,量词的这种范畴的动态游移反映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所体现的规约意象也就不同。规约意象不仅导致了量词的非范畴化现象,而且还促动了量词范畴的扩展,或者说导致了量词功能的游移。比如量词“条”,在规约意象的促动下,由最初表示长条形的数量范畴,如“一条街”、“一条河”等,扩展到“长方形的”范畴中去,如“条石”、“条桌”等,还可以扩展到长条形的范畴中去,如“条扇(裱糊后挂起来的画轴)”、“一条被子”等。“一条被子”中“被子”的规约意象是,由最初的表示数量的量词词性扩展到可以用来修改一个平面的形容词词性上来,“条”的语义不断抽象和泛化,可以折叠成长条状;而且通常是以长条状覆盖在人身上的,人体是个长条,因此被子也被识解为长条。这是量词“条”和名词“被子”形成选择关系的理据。因此,量词非范畴化的另外一个促动因素就是规约意象机制,这种促动机制不断的促动量词范畴进行动态游移以满足不断扩展的人类认知领域的需求。

四、结束语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非范畴化现象是语言实现创新和向前迈进的必经之路。为了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认知与表达需求,量词实体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从其他语言或方言中借鉴与之相关联的词汇,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化为己用。或者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让现有词汇和语法形式中的词汇丧失或扩展其范畴属性的典型特征,从而使之获得具有计量功能的量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又或者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使已有量词衍生新的表达方式或扩展原有表达形式的用途来表达新的概念。量词通常采用这三种途径,依赖其原有的形式和结构来表达新的概念。量词的这种自我更新能力其动力源泉就是非范畴化,非范畴化不仅使量词范畴属性成员的典型特征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还使量词词类概念网络与其他词类的概念网络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概念网络层次的交互激活和不断扩展正是量词保持活力的常态反映。这表明,非范畴化与范畴化是同样重要的认知原则和语言演变机制,二者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的创新意识的体现,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 作者简介:甘莉,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76。Email:lilyjob418@163.com。

●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2010WLH02)

● 责任编辑:何坤翁